



特别策划之森林的孩子胡冬林(一)

■ 杨明森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监事长)

品读胡冬林

胡冬林曾经在密林深处发现被毒饵诱杀的5只黑熊尸体,熊掌和熊胆都被取走,现场惨不忍睹。其中有一只母熊和3只幼崽全家惨遭灭门,另外还有一只棕熊。

当天晚上,胡冬林一口饭也吃不下。入夜,他走出门去,遥望着5只熊惨死的方向,已然泪落满襟。每当描写这些场景,胡冬林都感觉到痛心疾首。

只身进入大森林,胡冬林却从来不带刀,对自己的动物和植物朋友,不能伤害。他唯一的防身工具,是防暴催泪喷射器,万一遇到熊的袭击,最多让对方麻醉一会儿,不会受伤。

以自然映照人性美的胡冬林

胡冬林写作的目光,始终集中于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正如评论家所指出,胡冬林作品的关切点并没有离开人。他虽然远离人群,却深入人心,洞察人性。胡冬林说,我们只是地上的人,鱼是水里的人,鹰是天上的人,熊是山里的人。他是在自然与动物那里,寻找人类应该具有的生活和未来。

胡冬林反对那种文学只能写人的极端观点,而坚守文学必然指向人性的基本规律。中国好书榜单关于《山林笔记》的推荐意见说,胡冬林作品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中,反观人的生命之美,由自然之壮美映照人性之纯真。生态文学仍然是文学,其审美、教育、认识等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是古老的三大哲学问题。文学可以也应该参照和解读这三大问题,但不必也不可能将其严格分开。现代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如同战争,灾难能够考验人性一样,人性中的真、善、美、丑,在使用自然资源的利益争夺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人对动物的态度,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人与人的关系。从社会的大尺度来看,人怎么对动物,就怎么对人。

而胡冬林最担忧的,恰恰是人性堕落。他说,动物之殇,其实是人性之殇。

作为战士的胡冬林

胡冬林不仅仅是生态文学作家,更是坚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者。研究胡冬林的作品,一定要同时研究胡冬林的行为。否则,就可能把胡冬林读浅了,读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他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方式。他说,生态作家要以身作则,一方面是作家,一方面是战士,不仅仅依靠文字,也要身体力行去守护一方水土,守护生态环境。胡冬林在长白山生活的几年,不仅一直在写作,而且始终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直接对抗。他的对手,往往是凶险的,或者是非常强大的。

2011年初冬,胡冬林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去驻地看他。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刚刚寒暄两句,他就话锋一转,气愤地讲起长白山保护区里的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

他推挪着面前茶几上的几个杯子,演示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的具体位置,说着说着,那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就有些激动。

他调查好久了,已经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举报,而且是实名。他知道开发商背景强大,知道各种关

系错综复杂,但他不怕。

2017年底,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之后,吉林省对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违建别墅全部拆除整改。

无论胡冬林是不是第一个举报者,恢复了生态的大森林都一定会记着他。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被拆除的那一刻,魂归大森林的胡冬林,应该是欣慰的。

斗智斗勇的胡冬林

胡冬林在长白山有很多朋友,和他们一起进山采蘑菇,一起在小饭馆吃饭,听他们讲大森林的故事。朋友是朋友,关键时候,胡冬林翻脸不认人。那年冬天,有人在山里发现熊的足迹。有两个盗猎者得知消息,立刻开始寻找。胡冬林和这两个人是朋友,就说要采风,跟着他们进了山。

山上的雪很大,几个人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这只熊蹲卧的大树洞。蹲卧,就是冬眠。熊冬眠的地方,包括树仓、土仓和石仓。其中树仓,即树洞最多。而猎杀冬眠的熊,叫作掏仓。

两个盗猎者当即端起随身带着的扎枪,向着树洞刺去。胡冬林猛然冲上去,死死地攥住一人的枪杆。扎枪,就是梭镖。

由于事出突然,盗猎者吓了一跳。胡冬林说,他看见那人的眼睛里充满了血红的愤怒。

胡冬林对两个盗猎者说,你们这样刺杀,可能掏仓不成反而惊动了猎物。熊一旦冲出来,将会拼死反扑。盗猎者想了想,也有道理,就决定改用“堵杖”。

所谓“堵杖”,就是先用木头把树洞口堵住,再用扎枪刺杀,这样熊就跳不出来了。盗猎者开始四处寻找可用的木头,胡冬林点燃一根烟,一边抽着一边帮着找木头。过了一会儿,胡冬林建议说,天色已晚,为了安全,不如回早再来。盗猎者说也对。于是,三个人开始下山。

盗猎者没有想到,胡冬林刚才趁他们不注意,已经悄悄地把烟头塞进大树下的洞口。熊的嗅觉灵敏且非常讨厌烟味。熊冬眠,并不像蛇和青蛙那样深度睡眠,而是一种静静的“假睡”,只要有异常气味就会慢慢醒来,逃离险境,并且不再回到这个树洞。

当天晚上,山里下了雪。胡冬林知道,那只熊已经逃离,新雪正好可以掩盖它的踪迹。

也许是缘分吧,后来胡冬林多次见过这只熊。据他观察,这只母熊应该已经生产了3只小熊。

由于经常举报盗猎行为,有人声称要花十万元“办”了胡冬林。打匿名恐吓电话以及让人传话捎信的连接不断。胡冬林说,这种事不是遇到一次两次了,我一个快60岁的人,有什么好怕的。

2017年春天,冬林突发疾病,不幸去世。

这一天,是5月4日。

而十年前的这一天,2007年5月4日,冬林从长春搬到长白山,开始山居生活。

难道胡冬林与长白山前世有约吗?他推挪着面前茶几上的几个杯子,想象着满族先祖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意气风发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仰天长啸。如今,冬林真的全身心地拥抱白了。

长白不老,冬林犹在。

■ 对话胡夏林 (胡冬林之妹)

他的写作拥有一座大山



中国环境报:首先祝贺胡冬林老师的生态文学巨著《山林笔记》出版。在胡冬林老师离开我们3年后的今天,看到这样一部充满了胡老师个人色彩的作品,非常惊喜。请您介绍一下《山林笔记》这本书中文的背景和来源?

胡夏林:实际上,《山林笔记》本是在长白山区所记的日记,从个人角度讲,应该是秘不示人的私藏。因为其中记下的内容除了与山间动植物的“交往”,还有他个人的内心活动——快乐、难过、愤怒、忧郁,甚至有对一些人好事发泄内心不满时写下的文字。正如哥哥在二道白河的朋友宗玉柱所说——《山林笔记》的出版是一个意外。如果老哥活着,这些呕心沥血得来的,用风险甚至生命换取的财富,他理应一个人受用。

哥哥去世后,我把他2007年5月至2012年10月在长白山期间记下的山林笔记输入电脑,经过删改和整理,交给《作家》杂志社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连载,之后由时代文艺出版社集结出版。这套100万字左右的山林笔记,以哥哥的视角呈现长白山区动植物的生态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记述了他在长白山林区生活、写作、上山踏查体验的心路历程。每一个段落与叙述都十分生动,让读者不知不觉间随他进入林间荒野,身临其境地与他一起享受其中,也让人明显感觉到在城市与在山里生活的他有多么不同。偶尔从小镇回到城里办事,他的日记基本不记,或只是记些让他心烦的琐事和流水账,毫无生气;而回到山里,他就像立刻变了个人,兴冲冲乐此不疲每一篇山林笔记都长篇大论,充满激情。山林就像是他的家,那里的一切都是他的亲人,只有在山林里他才感到自由和自在。

中国环境报:一直以来,您都是胡老师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环境整理者。在您看来,胡老师的生态文学写作如此特别,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胡夏林:哥哥的生态文学写作,完全出于他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纯净的爱,这种爱是无偿价不求回报,毫无功利而然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应该是歌颂野生生命,反对或反思人类破坏自然

中国环境报:如果可能,这些文字本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作品?

胡夏林:山林笔记中所记下的文字,如果按照他

自己的设想,将会产生一系列自然生态作品——小说和散文随笔,这些作品将是一部部图文并茂的长白山动植物、菌类与四季风景的生动记录。他已经为将来的一些作品起好了名字:《熊冬眠树》《乌苏里黑闪电》《野菜课》《秋天的橡树》《春夜湖上》《野鸭低语》《黑啄木鸟》《花朵与种子》《枯树自述》《素花尾扇》《野猪传说》等等。其中《熊冬眠树》在长白山期间便开始动笔,几年间一直断断续续反复创作修改,离世前已经完成两万万余字。这是他积累素材时间最长,资料搜集最多,也是他下功夫最深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如果完成,将会是轰动文坛的一枚重磅炸弹。但是天不遂人愿,最终《熊冬眠树》成了一座未完成稿……

中国环境报: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胡老师在《山林笔记》中记录的文字,和他创作的作品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胡夏林:《山林笔记》是哥哥的素材库。他那些完成的作品几乎都可以从《山林笔记》中找到它们原始素材的踪迹。这些作品都是从上山所记的点滴片段中筛选过滤,加工打磨,刻画雕琢而成。每一篇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也有着相似的柔美与温情。这温情是以对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尊重热爱、尊重崇拜等无数因素构成的,他认为原始森林是陆地上动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是自然万物演化进化奇迹的大舞台,是物种间共生互动生命之网的完美典范。

中国环境报:一直以来,您都是胡老师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环境整理者。在您看来,胡老师的生态文学写作如此特别,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胡夏林:哥哥的生态文学写作,完全出于他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纯净的爱,这种爱是无偿价不求回报,毫无功利而然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应该是歌颂野生生命,反对或反思人类破坏自然



■ 宗仁发 (《作家》杂志主编)

长白山是胡冬林的文学领地

2017年5月4日胡冬林病逝。送别他之后,胡冬林的妹妹胡夏林给我打电话说:“哥哥还曾拿着《作家》一笔预付稿费,现在我把它退还你们吧。”胡夏林的话忽然让沉浸在低迷悲伤情绪中的我思维回到工作的轨道,我马上和她谈,稿费不但不还用还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要付给你。你把冬林留下的《山林笔记》整理出来,交给《作家》连载吧,咱们每期再配一篇熟悉胡冬林的作家朋友的文章,继续开“长白山笔记”这个专栏。

一言为定,就这样从2017年10月开始到2019年10月,《作家》连载了胡冬林的《山林笔记》18期,80多万字,并配有周晓枫、邱华栋、张守仁、叶广芬、彭程、乔迈、徐敏亚、朱日亮、张洪波、刘庆、任白、高君等作家纪念胡冬林的文章,这可算是《作家》杂志有史以来的一项浩大工程。在连载完成之后,我和尹涛、任白、陈琛几位朋友又一起合作策划了《山林笔记》这套大书的编辑出版。

自然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流派,若追根溯源的话,恐怕一定要找到18世纪英国的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才行。《塞耳彭自然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开启了自然科学的博物学研究史,同时它也是自然文学的最正宗的鼻祖。据说达尔文当年迷上博物学研究就是因为在他十六岁生日时得到他舅舅给他的一份礼物——《塞耳彭自然史》,包括达尔文一生中关于蚯蚓与腐殖土形成关系的论文,也大概是受怀特的启发写出的。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物也都深受吉尔伯特·怀特的影响。在自然文学滥觞的过程中,梭罗等人的写作观念中也不难寻找到怀特的影子。

胡冬林的创作体裁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广泛的,有长篇小说如《野猪王》,有长篇儿童文学如《巨虫公园》(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有散文集如《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等。但若论其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和今天摆在面前的厚重的《山林笔记》。胡冬林的这部分作品完全属于能代表中国的自然文学成熟状态的创作。自然文学是自身界定的,按照学者程虹的说法,它是指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形成于当代的一种文学流派。从形式上看,是指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在内容上主要是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写作者要有土地伦理观。也就是美国的“自然保护之父”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原荒纪事》中提出的“土地道德观”,“简言之,土地道德观把智人从土地部落的征服者变成了群落中一名普通公民,这意味着尊重自己的异种伙伴,尊重整个群落体系。”写作《原荒纪事》时的利奥波德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的冲突。他自称少数派,在《原荒纪事》的序言中,他说:“能够看见大雁比能看见电视更为重要,能够找到海棠花与言论自由一样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二是

自然文学的写作者要有一种位置感。我理解这种位置感与泛泛地写出与生态有关的那些作家不是一回事。它需要作家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安营扎寨。梭罗到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住了26个月,利奥波德在那个废弃的农场里也陆续住有一年多的时间。胡冬林从2007年从长春搬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历经5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观察长白山的动植物、植物、菌类,在荒野上学习博物学知识,留下了自然文学的宝贵作品。他把自己的生命与长白山的生态保护融为一体,在这里发生的山火会灼烤到他,看到人们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去打猎,会让他焦虑不安。发现珍稀植物温泉瓶小羊被人为毁灭,他到地再去寻觅。发生建高尔夫球场大量砍树和盗猎分子杀害5头野生黑熊的事件时,他像一个斗士一样勇敢地站在前线。他明确告诉人们:“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

为了获得书写自然文学的博物学知识,胡冬林的启蒙老师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动物学家、乌博士赵正阶。赵正阶先生早年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放弃了在机关的工作,来到长白山保护区进行动物学研究,主编有《中国鸟类志》。他还写有一部自称为“不伦不类”的《长白山动物志》,实际上这正是和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一样路数的博物学与文学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胡冬林的《青羊消息》就是借助动物学家赵正阶的视角和心理活动得以完成的。胡冬林写出的《蘑菇课》则是得益于长白山科学研究所的菌类学家王柏先生的指导。胡冬林在2011年8月3日的《山林笔记》中记载到:“约王柏老师来唠唠,照例谈蘑菇,建议我加上虫草、地衣、毒蘑菇。王老师说今年的虫草特别多,也可以抽空跟他上山采虫草。”此外,胡冬林在长白山还有不少“山里通”朋友,他和曾经是猎人的孙彦成为了至交,这些人带着他进山,向他实地介绍许多动物的习性,对他的写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